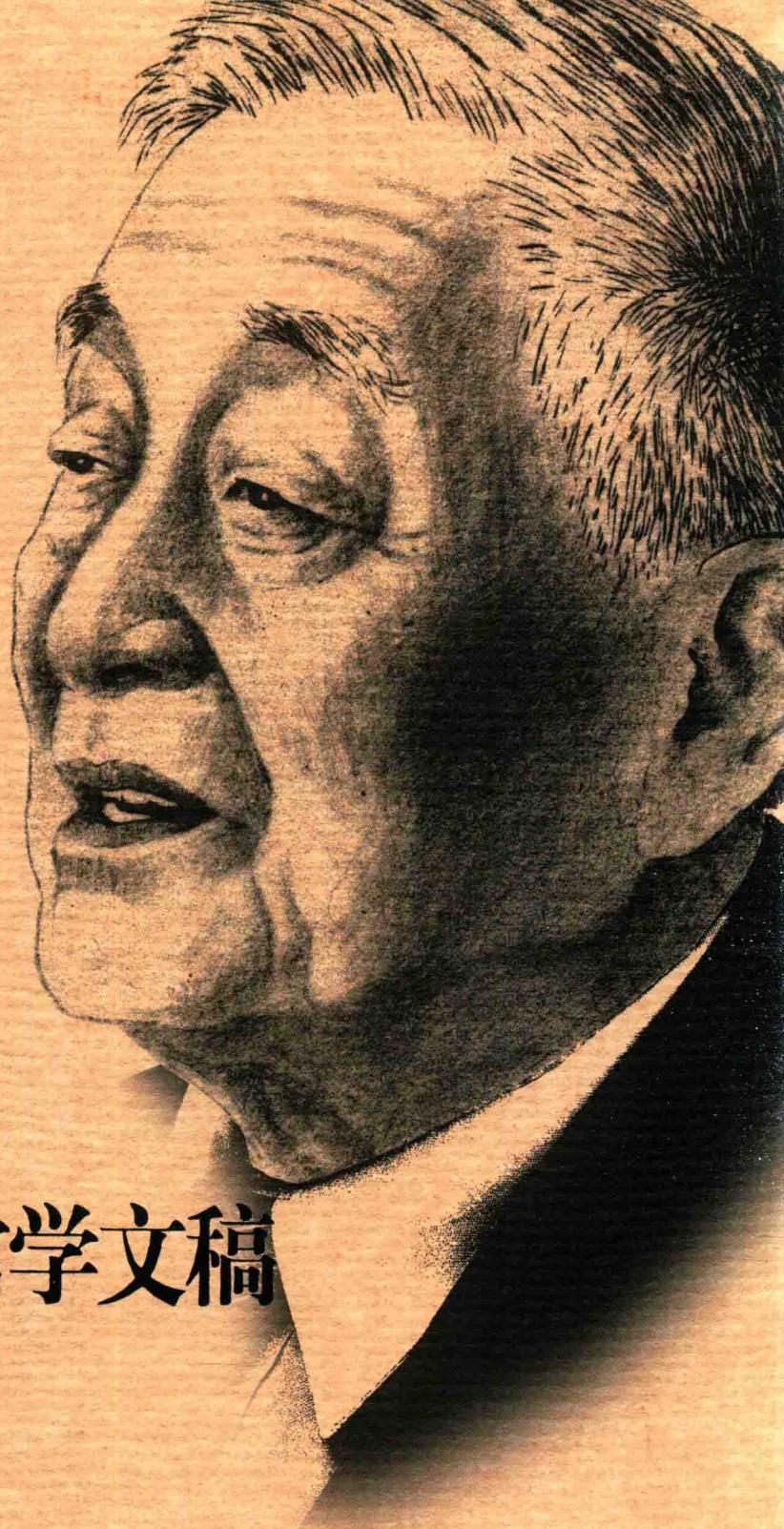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



图书馆学文稿

吴慰慈自选集

吴慰慈◎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TUSHUGUANXUE WENGAO

图书馆学文稿

吴慰慈◎著

TUSHUGUANXUE WENGAO

吴慰慈自选集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图书馆学文稿:吴慰慈自选集/吴慰慈著.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10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

ISBN 978-7-5656-3924-1

I. ①图… II. ①吴… III. ①图书馆学—文集 IV. ①G25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48328 号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

TUSHUGUANXUE WENGAO

图书馆学文稿

吴慰慈 自选集

吴慰慈 著

项目统筹: 杨林玉

责任编辑: 杨林玉

责任设计: 王征发

封面绘画: 王征发

责任校对: 李佳艺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cnupn.cnu.edu.cn

印 刷 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1 000mm 1/16

印 张 32.25 插页 2

字 数 369 千

定 价 7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编委会

顾问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玉田 方玄初 石仲泉 史秋秋 李志坚 刘新成
江 平 许 文 吴树青 何卓新 宋贵伦 张文启
陈先达 欧阳中石 金冲及 周一兴 郑必坚 逢先知
袁行霈 顾明远 徐惟诚 陶一凡 陶西平 满运来
戴 逸

编委会主任 崔耀中 韩 凯

编委会副主任 赵 峰 孟春利 刘 颖 梁立新 荣大力 王野霏
杨生平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万俊人 王中江 尹 鸿 龙翼飞 叶培贵 白暴力
李 强 刘 伟 孙武权 杨林玉 杨念群 吴国盛
张 际 陈 来 陈平原 陈雨露 赵汀阳 俞 斌
黄天树 黄泰岩 彭 林 韩 震

出版说明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自那一年开始，中国已经走过了波澜壮阔的30年。这是伟大的30年，是改变中国的30年，是震惊世界的30年，也是哲学社会科学蓬勃发展的30年。

在哲学社会科学这30年的辉煌成就里，浸透着为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奠基的老一辈专家呕心沥血的求索，也镌刻着寻着他们足迹的后来者追求真理的步伐。“学之大者，国之重器”。我们有责任将这些“大者”潜心研究的成果，重新编辑出版以飨读者。为此，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将这一套《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奉献给读者。她以自选集的体例形式，每年推出一批，争取在几年内达到百种以上。《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将系统展示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名家学者30年来的学思精华，展示他们的学术探索历程和风采。同时，为使这套《北京社科名家文库》更加丰富，编委会决定在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已出版的《当代著名学者自选集》中挑选符合体例的图书，编辑成《北京社科名家文库·纪念辑》，这将更完整地反映北京学人在学术风范和学术使命上的历史延续。

我们相信，《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将能够成为具有文化传承价值的经典性大型出版工程，成为集中展示首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成果的一个窗口。由于我们水平所限，定有不足之处，希望读者和同仁给予批评指正。

编 委 会
2009年11月



吳慰慈先生

学术自述

(一)

我的学术生涯得从中学时代说起。在一个人的求学道路上，中学是积累文化知识，养成好的学习习惯的重要阶段。我是上世纪 50 年代初考入安徽省枞阳县浮山中学的。该校坐落于安徽省五大名山之一的浮山东麓，环境清幽，风景宜人，是安庆地区的一所名校。它拥有一批优秀的教师队伍，文科和理科的主讲老师都很优秀。当时办学条件不是很好，生活比较清苦，但学习风气甚浓，的确是读书求学的好地方。我对于中学时代的深刻记忆就是刻苦求学，发愤读书。当年是早晨起床很早，唸两个小时的英语，紧接着便是上课，做作业，读课外书籍，整天忙个不停。课前预习，课后复习，定期总结，不懂就问，这是我在中学阶段始终坚持的学习方法。我的学习成绩在全年级中名列前茅。

(二)

1957 年 7 月，我在浮山中学高中部毕业，参加了全国统考，并以高分被北京大学录取，进入图书馆学系学习。北京大学是中国最负盛名的高等学府，当时我特别看重的是名牌大学，对于所学的专业考虑不

多。因为自己从小就喜欢看书,认为将来要是能在图书馆工作,看书会很方便。没想到,与图书馆学的缘分来得如此自然,这自然的一牵手,便是一辈子。

刚进北大图书馆学系求学时,我很年轻,不满 20 岁,当时没有别的想法,认为学这个专业就应该钻研这个专业,用力在这个学科领域内做些事情。首先是在学习上狠下功夫,每一门课程,每一个环节都学扎实。我不满足于老师在课堂上讲授的知识,课后我看了许多图书馆学书籍和当时发表的一些期刊论文。看多了那些专业论著以后,使我觉得图书馆学不是没有可以去研究的,有很多问题、很多方面、很多领域我知之甚少,需要自己去认真学习。在学习过程中,我不仅看书,而且去独立思考学科发展方面的一些问题。“看书”与“思考”两相结合,再加上老师们的指导,我对图书馆学专业经历了一个从不认识到底认识、从不自觉学习到自觉学习,从初步有一些感性认识再到产生了理性认识这样一个过程,更加坚定了学习和研究图书馆学的志向,这是我在北大四年求学生涯中最大的收获。我在学习中体会到,人在青年时代求学应博览群书,不仅要认真阅读专业方面的历史经典,而且应当涉猎与此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知识,例如思想文化史相关的中西哲学和历史,避免学识单一,视野窄狭。我从王重民、刘国钧等教授的教学和科研中领悟到,每研究一个问题,必须广泛搜集和详细占有资料,然后缜密考校,去伪存真,精深分析,由表及里,博于征引而慎下论断。他们长于考证,却又不止于考证,而是始终注意从具体史实的考证分析入手,溯其渊源,考其流变,以把握所研究问题演进的大势,探求其发展的规律。这种治学方法,不仅在当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对我以后的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北京大学是哺育我成长的摇篮,它以其厚重的学术传统与科学精

神,为我提供了一个优越的学术环境。就是在这个享誉国内外的学术环境中,我得到了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上的积累,受到了严谨的科学精神的熏陶,为后来实现自己的学术抱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

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曾有一段在天津图书馆工作的经历,其时间是1961年8月至1973年9月。在这12年中,我做过基层馆培训、业务辅导、宣传、古籍编目、参考咨询等业务工作。通过实践使我认识到,做图书馆实际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光有点书本知识,不结合实践经验,也很难再有进一步的发展,实践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这是书本上学不来的。上世纪60年代初,因基层馆培训和业务辅导工作的需要,我先后编写了《小型图书馆分类表》《区、县图书馆分类范例举要》《图书馆藏书建设概要》《小型图书馆藏书清点法》等小册子。这套丛书的选题、素材、案例、解析、操作方法都来自实践,实用性很强,能较好地解决当时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这个事实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研究图书馆学应该坚持唯物主义,脱离唯物主义基础的研究难免产生思维的局限性,偏离实际需要,形成对实践不起指导作用的空泛理论。这套丛书的社会效果说明:研究图书馆学,不能单纯从抽象的定义、概念、模式出发,它应该成为“从实际手段来追求实际目的的最实际的运动”(《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

在天津图书馆的工作经历是宝贵的,在我的记忆中难以磨灭。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获取的知识,对我后来从事教学是一种很丰富的营养,为我进一步研究图书馆学奠定了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

(四)

1973年9月,我奉调回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任教。如果说每个人一辈子都有个转折点,那么1973年回到北大,毫无疑问就是我人生的转折点。重新回到母校,心情上变得很好。因为我学习在北大,现在能回来为母校的发展,为图书馆学学科建设贡献力量,感到无比荣光。从1973年至1976年,中华大地仍延续特殊的年代。我当时利用业余时间阅读了一些西方科技哲学的书籍,借此来启迪思路,开拓思想,促进发散性思维。

自从1977年9月起,我在北大开始独立承担《图书馆学概论》这门基础课的教学工作。当时这门课程是作为图书馆学专业的入门课程开设的,即通过讲授,使初学者对图书馆学的全貌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学生反映说“教学内容单薄”“缺乏科学的理论高度”。这是同时期各高校普遍存在的问题,我决心面对我到北大任教后的这一严峻挑战。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正确阐释图书馆这一社会现象,揭示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内在规律,指导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对于图书馆工作者来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学习,能使自己的视野从自己所处的繁杂事务中解放出来,树立图书馆事业科学发展观。我本人长期从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也没有“枯燥”“厌烦”“索然无味”的感觉,这是我的一种学术追求,已经成为我的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有人问我,在教学工作中,你做了哪些有开拓意义的工作?是不是有开拓意义?我自己不敢这样说,还得请担任这门课程的老师们去评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图书馆学朝着综合性方向发展,各相关学科

互相渗透融合,由技术方法描述逐步向理论思维升华。国外一些图书馆学理论著作也相继传入。经过数次全国性的图书馆学基础课研讨会,提高图书馆学基础课理论教学层次的共识逐步达成。在这样的学术环境和学科背景下,从1984年开始,我在“图书馆学概论”教学大纲中明确规定:本课程不仅担负专业启蒙教育的任务,其教学目的还在于帮助学生运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系统地掌握图书馆学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弄清楚图书馆学研究范畴的过去、现状和未来趋势,为学习其他专业课奠定初步的理论基础。这是教学指导思想、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重要转变。

这种转变不是轻而易举的,我在教学小组帮助下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主要做了以下有建设意义的工作:①编写新教材和辅助教材。主教材《图书馆学概论》初版于1985年,2002年出版了修订本,2008年又出了修订二版,并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和“‘十一五’规划高等学校核心课程教材”。辅助教材有:《图书馆学概论学习指导书》《图书馆学概论教学参考文选》《图书馆学概论教学讲稿》《图书馆学概论复习提要》《图书馆学概论名词简释》等。②坚持教学改革。在改革过程中,高度关注课程建设,用现代观点重新审视图书馆学的教学内容,注意把握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联系和区别,基本概念的延伸或更新,视野的拓宽和新研究领域的开辟,借此弘扬图书馆学“崇尚实践,崇尚理性”的精神。③引进国外图书馆学先进成果。社会形态的变迁,媒介环境的变革以及受众接收习惯的潜移默化,国外图书馆学原有的学科体系内的各个分支学科领域都在结合新的命题展开新的研究。积极引进国外图书馆学先进成果,可以为我国图书馆学教学提供高水平发展的参照系。④通过多种途径激励年轻教师投入本科教学工作。⑤严格执行学校各项管理制度,保障良好的教学秩序,坚持高质量

的本科教育教学标准,把本科教育不断推向新的高度。⑥认真备课,常改常新。我坚信,要想真正成为一名好教师,必须对自己执教的课程有极大的兴趣。兴趣是深入研究的前提,只有自己研究得深,才能把课讲得充实生动。比如“图书馆学概论”这门课,内容比较广泛,如果讲得过于抽象,必然使同学们失去兴趣。我在授课中把一些抽象问题和实际案例紧密结合起来,使同学们觉得的确是学有所用。这门基础课我讲过 40 遍,写了 40 本教学讲稿,常改常新是我始终坚持的做法,也是我在备课中努力遵循的信条。

有人曾问我,您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课程的教学做了很多工作,您主讲的“图书馆学概论”是否得过什么奖项?我主讲的这门课程及其教材获奖比较多,我也记不清楚了。有两次获奖对我鼓励很大。第一次获奖是在 1985 年,我被评为北京大学优秀教学奖。北大这个奖要比在社会上评奖难得多;当时我的职称还只是副教授,我是第一批获此奖项的北大教师,这个奖给了我很大的激励。第二次获奖是在 2006 年,北京大学精品课程“图书馆学概论”被教育部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我有幸成为国家级精品课得主,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国家级精品课是集体的努力和智慧,也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作为基础理论课程,自北大图书馆学系开创之初便设立这门课。半个多世纪以来,刘国钧、舒翼翠、周文骏、张树华、吴慰慈、邵巍、刘兹恒、王子舟、张广钦、张久珍等都讲授过这门课,始终保持着很高的教学水平。

(五)

1983 年,我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94 年我取得了博士生导师的资格,1996 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自招收博士生后,我就不再招收硕士生了。因为精力有限,只能集中精力培养博士研究生。从 1983 年

至今,我总计培养出 60 多位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其中大部分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美国、荷兰、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工作;博士研究生中的多数在大学任教,有些已晋升为教授,并被遴选为博士生导师。我为他们的进步和成就感到喜悦和欣慰。博士生导师是一个工作岗位,应该对国家、本学科、学生本人负责。在整个培养过程中,应该始终贯彻“从严要求”的精神。博士生刚进校,我就把他们召集在一起,从做人和做学问两个方面明确提出要求。做人的要求是:要有理想,诚实踏实,谦虚谨慎,奋发上进,团结互助。做学问的要求是:要刻苦钻研,严谨治学,勇于探索,多读书,多思考,多写作。

博士生入学后,首先要指导他们订好培养计划。在培养计划中,最重要的是要按照专业、研究方向和培养高质量研究生的要求,列出必读书目。在必读书目的确定上,一定要下一番功夫。对于这一书目,不仅要求博士生把它读完,而且要真正读懂。事实说明,凡是按照这一要求去做了的,在专业水平上都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我还帮助博士生选好课。选课应围绕研究方向,打好专业基础,提高科研水平来进行。在课程设置上,除学位课外,要在学分不超载的情况下多选选修课。我帮博士生选课时,通常包括三类课程:一类求精专,二类求实用,三类求广博。第一类旨在进一步夯实博士生的专业基本功;第二类直接与研究课题和学位论文挂钩;第三类旨在进一步打开博士生的视野,使之了解本学科前沿问题。

对于博士研究生来说,增强科研能力是至关重要的。我认为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制度和培养模式要革新,应根据不同类型博士生的特质,合理设计培养过程,建立和完善灵活多样的博士生培养模式,逐步摆脱那种统一教学计划、统一学制、统一学习与考核方式的“大一统”模式。在博士生培养过程中,既坚持有统一的基本要求,又强调因材施教,因

势利导,注意依据个性塑造人才,注意为他们的自由发展留下充足空间。

为了鼓励博士生从事科研活动,我确定了由抓小论文(专题论文)到大论文(学位论文)的工作思路。因为论文写作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只有写出若干篇与学位论文题目有关的各个专题的高质量论文,才能保证写出符合要求的学位论文。按照这一思路,我们建立了对博士生科研论文发表情况定期统计通报制度。我不主张博士生把主要精力放在搞拼凑出来的所谓“全书”“辞书”上,注意把博士生的主要精力引向专业学术研究,争取他们在本专业领域内有所建树。

作为导师,要下大力气抓博士学位论文的质量。首先要抓好论文选题,论文选题一般由博士生本人在二级学科领域内做广泛的调查研究后独立提出,导师抓选题应注意以下几点:①选题应属于本学科前沿;②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应具有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③学科点的经费和设备应具有完成本选题的基本条件;④导师对所选题目应具有指导能力。论文选题确定后,要组织五位教授组成的专家群体对该选题进行评价。

博士学位论文必须是一篇完整的系统的有创意的学位论文。对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的审核,我想至少要达到以下几点:①准确性。要做到数据准确,引证确切,文义朴实,结论中肯。②整体性。通篇前后呼应,避免拼凑、重复、脱节和比例失调。③简明性。要求思路清晰,行文流畅,语言精练,图表醒目。④规范性。除了论文本身的写作规范外,还要注意加强排版过程中的审校。

学无止境,写作的水平也是没有止境的。只要反复琢磨,不厌其烦,就可以逐步提高论文的写作水平。

(六)

读书、治学、著述对于学者来讲通常三位一体的。要想在学术上做出一些成绩,很重要的一点是得有科学的方法。有人问我:你在读书、治学方面有些什么方法和经验供后学晚辈参考?我认为,作为一名教师,要尊重学生,关爱学生,教书育人;一定要把学生当朋友,善待学生,绝不可以做远离学生的“教师爷”。我一生珍视和谐,努力在我所参与和所能影响到的范围内创造一个和谐的人际环境与友善的社会氛围,才赢得了一个属于我自己的较为平实的人生。我经常提醒和告诫自己:为人要谦和,为学要扎实!

在为学方面,我很勤奋,从中学到大学,乃至在大学任教期间都是如此。只有勤奋,才会有知识的积累。在勤奋的基础上,我注意打好两个基础,其一为专业知识基础,其二为方法论知识基础。在这两个基础之上,一方面向内深究,扎根固本;另一方面向周边拓展,广泛涉猎相关领域,会通博采,加宽基础,进而运用科学方法,围绕基本问题、前沿问题、重大现实问题开展长期系统的研究。

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一直关注和跟踪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进展,认真总结图书馆学研究中具有方向和趋势性的问题;我始终坚持图书馆学的研究面向应用,重点研究世界和中国图书馆的重大现实问题;我高度重视信息技术对图书馆学学科建设的影响和应用。

(七)

1996 年至 2002 年,我在担任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系主任期间,还一度兼任该系党委书记。这段时间我的工作很忙,既要搞教学、科研,又要抓行政工作和党务工作。这样本职工作与社会兼职必然会产生一

些矛盾。好在有些社会兼职是职务性的,例如,我曾经担任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国家教育部图书馆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兼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务,其工作都有一定的阶段性,通过科学地安排时间,当然也包括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我还是挺过来了。对于我个人来说,虽然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做这些学术兼职工作,但只要是为社会服务,有助于推动图书馆学学科建设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还是值得的。这些社会兼职也帮助我思考很多问题,使我学会了如何抓图书馆学学科建设,如何组织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学术研究,如何发现有发展潜力的中青年学者;同时也增强了我独立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作为一名学者,不能过于书生气,要学会应对不同层次、不同对象的学术研究。

有人问道:你对年轻一代图书馆学人的科学研究有什么建议?我想,图书馆学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它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来源于图书馆工作实践,是图书馆工作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理论与实践结合是图书馆学研究人员的指导思想,创造性的想象力不是凭空诞生的,也不仅仅是书本上得到的,其最终源泉是参与社会实践。21世纪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有必要、有责任将实践中出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宏观性问题及时纳入理论思维的视野,在深化理论研究,推进学科建设的同时,对处于变革时代的中外图书馆事业提供理论支持。

图书馆学研究中存在着虚妄和臆想的现象必须转变。我希望年轻一代图书馆学人踏踏实实地从图书馆和用户的需求出发研究问题,从对图书馆形态的认识,服务理念的变化,到资源增长模式,服务方式,体制与机制等,都突破了传统图书馆的范式,亟待理论上做出新的总结和概括。对新的信息环境变化的预测与研究并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建立

现代图书馆学,不仅是 21 世纪图书馆学的学科知识生长点,而且是 21 世纪图书馆学的重要研究课题。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希望年轻一代图书馆学人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走向胜利的彼岸。